

## 明代江南文人雅俗观念的嬗变

汪映雪, 陶小军

**摘要:** 中国古代的雅俗观念具有时代性, 文人阶层以其较高的审美修养对雅俗之辨产生了深刻影响。明代文人继承和发扬了前代文人所发展起来的雅文化, 形成了一套生活美学的实践标准。随着江南成为经济和文化重心, 江南地区的文人在雅俗审美中处于权威地位, 他们所带动的消费观念亦成为一时之风尚。这使得明代江南文人的雅文化透过市场机制流入了世俗社会, 成为世俗大众纷纷效仿的对象。由于文人所代表的雅文化是其阶级优越感的来源之一, 并借以获得来自其他阶层的普遍推崇, 因而文人格外注重雅俗区格, 以维护自身的精英属性。随着晚明社会中僭越行为的增多, 江南文人越加重视品鉴能力, 强化文人的主体作用, 从而把控雅俗观念的主导权。

**关键词:** 明代江南地区; 雅俗观; 文人生活

**作者简介:** 汪映雪,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陶小军, 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晚明书画消费与文人生活”(16BA008);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艺术与中国精神研究”(2016ZDIXM028);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江苏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007)。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17.03.016

—

雅俗之辨, 在古代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 雅俗的标准并不统一, 雅俗的内涵也不固定, 而是一直处在动态变化之中。

从本源上讲, 雅俗间的区别, 就像君子与小人之间的关系一样。人们以品性来划分君子与小人, 而雅俗的区格则是注重于人的情趣。雅俗观是中国艺术中的重要观念, 也是鉴赏与评论中的核心内容。实际上, 文人对雅俗观念的影响是长久而深远的。在明代晚期社会, “士农工商”四民阶层的界限日趋淡化, 由于鉴赏能力和审美取向的最终决定因素是文人的知识和修养, 文人的生活意趣也逐渐被其他阶层认可并崇尚。

从语言的形成看, “雅”的使用最初来源于《诗经》中对语音学所引发的议论, 在早期是一个单独出现的概念。《毛诗序》云: “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风, 谓之雅。雅者, 正也, 言王政之

所由兴废也。”<sup>[1]</sup>此时评价“雅”的标准只在于强调特定的政治阶层。至魏晋南北朝,“风雅”成为一种具有普遍褒扬意义的词语,用以称赞人物的德才出众,尤指具有“魏晋风度”的文人士大夫。《文心雕龙》中提出“雅俗异势”的对立观点。魏晋以后,掌握着话语权的文人阶层便开始借由雅俗的概念来进行文化区分,以凸显文人精神追求的独特性。“汉末魏晋之后,‘雅俗’渐渐成为一对具有审美意义的评价性概念并被普遍用之于人物品藻和诗文书画鉴赏中。这一现象具有重要意义:证明了‘文人身份’的确立。”<sup>[2]</sup>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了晋人庾龢曾评价雕塑家戴逵所做的佛像“神犹太俗,盖卿世情未尽耳”<sup>[3]</sup>,是对魏晋雅俗品评风尚的继承。

宋代崇文抑武的政治环境促进了文人集团的崛起,文人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以苏轼、米芾为代表的文人名士的审美风尚和品评标准遂成为文化主流,左右着世人的雅俗观念。在艺术趣味上,他们发展出一套崇尚尚意的理念,主张追求自然清新、诗情画意的艺术境界。在北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里,评黄筌、徐熙时尚不加褒贬:“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二者春兰秋菊,各擅重名,下笔成珍,挥毫可范。”<sup>[4]</sup>而米芾在《画史》中却对黄筌批驳道:“黄筌虽富艳,皆俗。”<sup>[5]</sup>可见宋代文人已开始利用雅俗观念来主导艺术品评,并将文人理念注入到雅俗的判别中来。

在生活经营方面,宋代文人阶层中出现了对于古物和艺术品的赏玩文化,赵希鹄在《洞天清录》序言中表达了构筑优雅生活的必需要物:

明窗净几,罗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时取古人妙迹,以观鸟篆蜗书、奇峰远水,摩挲钟鼎,亲见商周。端砚涌岩泉,焦桐鸣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谓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sup>[6]</sup>

可见对于雅俗的观念,宋人不只停留在思想的讨论,也开始在生活中加以实践,利用“雅物”来营造符合文人审美意趣的生活方式。对雅物的品赏便发展成为一种在士大夫阶层中稳定流传的雅文化,品赏行为也成为风雅文人给世人留下的美好形象之一。

入元之后,大批文人失去了科举进仕的正常渠道,不得不放逐于野,将文艺活动作为终身寄托,形成了以隐逸为特点的雅文化。江南地区成为隐逸文人的聚集区域,并产生了赵孟頫、倪瓒、顾瑛等一批优秀艺术家和品赏家。基于文人群体普遍尊古崇贤的特性,明代文人的雅俗观念深受前人的影响,正如钱谦益所言:

自元季迨国初,博雅好古之儒,总萃于中吴,南园俞氏、笠泽虞氏、庐山陈氏,书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景、天以后,俊民秀才,汲古多藏,继杜东原、邢蠡斋之后者,则性甫、尧民两朱先生,其尤也。其他则又有邢量用文、钱同爱孔周、阎起山秀卿、戴冠章甫、赵同鲁与哲之流,皆专勤绩学,与沈启南、文徵仲诸公相颉颃吴中,文献于斯为盛。<sup>[7]</sup>

除了在文艺思想上继续主导着雅俗观念,明代文人在生活场域中继承和发扬了宋元时期的赏玩文化,总结出一套优雅脱俗的生活实践标准。对雅物的赏玩是文人生活的重要内容,在富有诗情画意的生活场景中,文人们能在世俗挤压下仍创造出超尘脱俗的雅味生活,于现实世界中践行着文人化的雅俗观念。

## 二

江南地区崇学好儒的文雅风气自唐宋以来便十分兴盛,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明代的江南地区人才荟萃,有“冠带衣履,独江南甲天下”<sup>[8]</sup>之盛誉。“有明一代共取进士 24 866 人,其中江南八府人士多达 3 864 人,占全国比例 15.54%。在科试名次上,江南也居前列,在明代 89 名状元中,江南人士有 21 名,占 23.60%;榜眼、探花及会元,也以江南人士居多。”<sup>[9]</sup>然而,江南文人在明代政治上却屡屡遭受不公正待遇,时任吏部尚书的王翱曾明确记载了明英宗对江南文人的偏见,“英宗尝言:‘北人文雅不及南人,顾质直雄伟,缓急当得力。’翱由是益多引北人。”<sup>[10]</sup>在英宗皇帝的观念里,南人的文雅气质反而阻碍了他们仕途上的成功,而仕途的不顺也让江南文人分外怀念江南的闲雅生活。

另一方面,江南远离京畿,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便成为在野士人的理想隐居之地,而大量文人汇聚于经济发达、环境优美的江南地区,又不断增强了此地清新儒雅的文化气息。到了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经济和文化重心,呈现出全面赶超北方的态势。

明代江南民众对文化教育投以持续的热情,江南文人能够获得较高的文化优越感。“(苏州府)布衣韦带之士,皆能擒章染墨。……(松江府)田野小民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sup>[11]</sup>在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整体氛围中,文人阶层作为雅文化的象征,受到了其他阶层的普遍景仰。例如徽商吴龙田曾坦言:“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sup>[12]</sup>

明代江南文人对本地的文化盛景亦充满自信。吴伟业称:“吾吴如泰山出云,不崇朝而雨天下,命世名贤,接踵林立。”<sup>[13]</sup>这种自信更直接表现在他们对雅文化的引领,明人王士性曾于《广志绎》中指出:

姑苏人聪慧好古……又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推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赏识品第本精,故物莫能违。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sup>[14]</sup>

在明代中晚期,地处江南地区的文人操控了雅与俗的话语权。苏州亦成为明代凝聚雅士品位的中心,他们崇文好古,在日常的生活起居、品赏玩物中处处表现出高贵优雅的不俗品位。以至于张岱在提到明末浙人模仿苏州服饰的风气时颇为不服地说:“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模仿……何必攀附苏人始称名士哉?”<sup>[15]</sup>

江南文人带动了明代中后期社会大众的审美风尚,以其浓厚的雅文化气息引得各地效仿,据张瀚总结:

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sup>[16]</sup>

由于江南文人在雅俗审美中的权威地位,他们所带动的消费观念亦成时尚,被其他阶级参照模仿。在此情形下,明代雅文化透过市场机制流入世俗社会,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江南

名士李维桢曾为新安商人之子徐唐撰墓志铭,记其:“所御冠帻衫履,杯案屏几,酒醕胃脯之属,大都作吴会人状,邑后进争趋之。”<sup>[17]</sup>可见江南文人所代表的雅文化对社会其他阶层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江南文人主导的雅文化对明代书画市场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震荡,自书画成为文人雅玩中的核心元素后,书画便成为雅文化的象征物,“能扑面上三斗俗尘”<sup>[18]</sup>。一方面,明代江南文人对前代文人画作极力推崇,引起了富商巨贾的纷纷仿效;另一方面,已成为雅文化标志的明代江南高士如沈周、文征明等人的书画价格甚至能够与古人比肩。对于这种书画消费风尚的变化,王世贞的感受颇为强烈。他说:“画当重宋,而三十年来忽重元人,乃至倪元镇以逮明沈周,价骤增十倍。”<sup>[19]</sup>同时,王世贞也道出了书画消费风尚变化的主导者即为吴地文人。“近来吴子辈争先觅胜国赵承旨、黄子久、王叔明、倪元镇画,几令宋人无处生活,余甚为扼腕。”<sup>[20]</sup>类似的言论还有沈德符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雅文化观念自江南文人至富商新贵的传导过程:

始于一二雅人,赏识摩挲。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橐相酬,真贋不可复辨。以至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蔽不知何极。<sup>[21]</sup>

以苏州文人为代表的江南文人群体象征着雅文化的风度,定义着雅文化的内涵,成为了世俗大众所崇拜和效仿的对象。他们也借由作为雅文化化身的地位彰显着文人阶级的优越性,进而享受文人阶级的特权。因此,雅俗之辨在江南地区便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

### 三

明代江南地区文事昌盛,聚居于此的文人们承袭着古人尤其是宋元两代的雅俗观念,继续践行着雅文化的生活经营。文人所代表的雅文化成为其阶级优越感的来源,能够彰显其高贵的地位,获得来自其他阶层的普遍推崇,进而引发富商巨贾们的效仿。这让文人因面对被追赶超越的危机而格外注重雅俗区格,以维护自身的精英属性。

时代发展至明代中后期,当时的文化主导者将雅俗辨证的目光从形而上的“道”转向了形而下的“器”,开始重视日常生活趣味的经营,并运用自身的影响来引导大众审美取向。明代中晚期是一个“尚雅”的社会,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统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开始。随着此阶段资本主义在中国江南地区萌芽,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为有闲阶层优雅的休闲生活带来了可能,奢靡风气日趋浓厚。

明中期经济的发展令物质消费风气骤然大增,投入赏玩行列的人群已无法清晰区分出文人或商贾的界限。“文化菁英用以避俗自足的鉴赏活动,垂至后世,已渐趋世俗化,而与市场活动缠结甚深。”<sup>[22]</sup>字画、古玩、鼎彝的搜集与真伪之争——这些原本归属文人群体的赏玩活动被市场所引导,增加了雅物的商品附加价值,由此引发了大众的追随仿效。晚明饮茶风俗的下移和普及便是一例。茶作为中国文人生活中的代表饮品,在明代晚期发展成为市井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茶馆和茶坊便如雨后春笋,迅速在乡村和城镇开设起来。有关茶馆

的记载在明代中后期也多起来,既有私人的茶室、茶寮,也有公共的茶坊、茶店。”<sup>[23]</sup>

类似的,书房作为文人身份的标志之一,其布置不仅是单纯的装饰美学,更主要是通过生活场所的精致化以期达到始终如一的优雅。在屠隆《考槃余事》所描述的文人书房中,“几榻、琴剑、书画、鼎研之属,需制作不俗,铺设得体,方称清赏”<sup>[24]</sup>。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展示了一个理想化的文人生活情境:

书斋宜明净,不可太敞……斋中永日据席,长夜篝灯,无事扰心,阅此自乐,逍遥余岁,以终天年。此真受用清福,无虚高斋者得观此妙。<sup>[25]</sup>

这些生活场域的改造,反映出明代文人对内在雅俗观念的外化实践。符合此种优雅标准的文人名士能够被社会赞誉为高士,这些高士所标举的生活方式是脱俗的,他们尤其强调在言行举止中的优雅和清高的气节,以便远离凡俗的侵扰。

明代晚期,雅俗的辨别在文学作品、艺术鉴赏或生活风格上渐渐表现为品位的竞争。当文人倡导的雅文化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被商人大量模仿,文人便开始利用独有的鉴赏能力来区格雅俗,维护自己的社会文化地位。他们将附庸风雅者批判为好事之家,对不懂鉴赏的消费者大加贬低,以此来强调雅士与俗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今贵家子弟,往往致饰精舍、垆香、瓶卉珍玩种种,罗列于前,而一经四籍,未尝触手。”<sup>[26]</sup>面对这种只会豪掷购藏却不懂品赏的好事行为,以正统自居的文人多报以鄙夷的态度。

正是受到雅俗焦虑的驱使,以文震亨为代表的精英文人秉持着区分雅俗的初心著书立说,使得晚明涌现出一批雅俗指南类的书籍。然而,当此类书籍在社会中泛滥热销时,它便推动了雅文化成为流行文化的一个部分,丧失了其原本清高独立的本真。

这一时期雅俗之间区格的标准也日益增强,由外在表现内化为个人美学禀赋。文人开始强调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因素。雅不仅在于物质消费的象征性,更进一步延伸至品鉴的行为和品鉴者自身的态度之中。“有野趣而不知乐者,樵牧是也;有果瓜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达官贵人也是。”<sup>[27]</sup>正确且自然地完成品赏需要深厚的文化涵养,多年古典知识的训练,甚至几个世代积累的家学修养。

相对于商贾暴发户常以炫耀性的物质消费复制文人生活,文人则透过无法速成的闲赏美学展示其文化积淀,将雅文化诉诸于个人品行的修养。为了在流行性的闲赏风尚中突出个性、辨别雅俗,文人亦开始强调“格物”的深度。这实际上是以抽象和难以捉摸的美学表现“雅”,以区格易仿易得的“俗”,具体表现为晚明社会中日益推崇生、拙、痴、狂等古怪形象,甚至发展成以丑为美的惊世观念。这种雅文化的极端化发展,体现了雅俗观念在江南文人主导下的流变。

明代江南文人主导下的雅俗观念是一个流动性的相对概念。面对早期的雅玩活动被后起新贵效仿甚至赶超的现象,江南文人转而重视品鉴能力,强化文人的主体作用,从而牢牢把握着雅俗观念的控制权,引领着社会潮流的变化。

#### 四

雅俗观念是中国美学里的重要范畴,雅俗观念的兴起与其内涵的流变自古以来皆受到文人阶

层的引导和影响。明代江南地区成为文化重心,闲居于此的江南文人凭借着生活场域的行为经营外化着雅文化,获得了其他阶层的崇敬。由于江南文人在雅俗审美中的权威地位,他们所带动的消费观念亦成时尚,被其他阶级参照模仿。在此情形下,明代雅文化透过市场机制流入世俗社会,成为一种普遍性的社会文化。为了凸显精英性,江南文人尤为重视雅俗的区格,文人凭借其出色的品鉴能力掌握着雅文化的话语权,文人文化与雅文化渐趋融合。到了明代后期,雅俗的辨别在文学作品、艺术鉴赏或生活风格上渐渐表现为品位的竞争,使得雅文化的形式日趋多样。

#### 参考文献:

- [1] 孔颖达.毛诗正义[M]//影印十三经注疏.阮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272.
- [2] 李春青.论雅俗——对中国古代审美趣味历史演变的一种考察[J].思想战线,2011(1):111-116.
- [3] 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0:52.
- [4]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34.
- [5] 米芾.画史[M]//宋人画论.熊志庭,刘城淮,金五德,译注.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132.
- [6] 赵希鹄.洞天清录[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3.
- [7]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M].台北:世界书局出版社,1985:303.
- [8] 朱国祯.涌幢小品[M]//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2.
- [9] 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7,34(2):171-178.
- [10] 张廷玉.明史[M]//二十四史.北京:中华书局,2000:3129.
- [11] 赵弘恩,黄之隽.江南通志[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0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601.
- [12] 袁中道.珂雪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39.
- [13] 吴伟业.吴梅村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783.
- [14] 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97:33.
- [15] 张岱.琅嬛文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5:142-143.
- [16] 张瀚.松窗梦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70.
- [17]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497.
- [18]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M].北京:中华书局,1997:255.
- [19] 王世贞.觚不觚录[M]//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440.
- [20] 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M]//中国艺术文献丛刊.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472.
- [21]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653.
- [22] 王鸿泰.雅俗的辩证——明代赏玩文化的流行与士商关系的交错[J].新史学,2006(4):73-143.
- [23] 黄一斓.明晚期日常生活中的尚茶风俗——基于同期小说材料的考察[J].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8(1):85-91.
- [24] 屠隆.考槃余事[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319.
- [25] 高濂.遵生八笺[M].成都:巴蜀书社,1992:309.
- [26] 姚士麟.见只编[M]//王云五.丛书集成初编: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61.
- [27] 陈继儒.花史跋[M]//致新.历代小品性灵.武汉:崇文书局,2004:155.